

「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 (Olo Valk) 著

董晓萍 译

信仰故事学



「跨文化研究」丛书 78

「法」金丝燕 董晓萍 主编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法] 金丝燕 董晓萍 主编

“跨文化研究”丛书 (78)

信仰故事学

[~~豪沙尼亚~~] 于鲁·瓦尔克 (Ülo Valk) 著

董晓萍 译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9年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信仰故事学 / (爱沙) 于鲁·瓦尔克著; 董晓萍译.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9.8

ISBN 978-7-5202-0531-3

I. ①信… II. ①于…②董… III. ①信仰—研究
IV. ①B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9) 第 160137 号

责任编辑 帖慧祯
封面设计 程 然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969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印 张 6.375
字 数 95 千字
印 次 2019 年 8 月第 1 版 201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02-0531-3
定 价 4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跨文化学理论与方法论”
(项目批准号: 16JJD750006)

欧盟与非欧盟高校 Erasmus+合作项目(2017—2020)
综合性研究成果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
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敦和学术基金

资助出版

“跨文化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乐黛云 [法]汪德迈 (Léon Vandermeersch) 王 宁 程正民

[法]白乐桑 (Joël Bellassen) 陈越光 李国英 李正荣

[法]金丝燕 王邦维 董晓萍 王一川 周 宪 赵白生

[英]白馥兰 (Francesca Bray) [法]劳格文 (John Lagerwey)

[爱沙尼亚]于鲁·瓦尔克 (Ülo Valk) [日]尾崎文昭

总 序

“跨文化研究”丛书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跨文化视野下的汉字、汉语与民俗文化研究”的综合性成果，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执行，由承担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化学研究生国际课程班”教学任务的中外学者撰写。

跨文化研究事业发端于北京大学，奠基人是北京大学著名教授乐黛云先生，乐先生同时也是中国比较文学专业的开创者，以往中国跨文化研究领域的学者也大都集中于这个领域。在法国，由新一代汉学家金丝燕教授领衔，开拓了跨文化、跨学科和跨文本的学科建设。北京师范大学近年开展的“跨文化学”学科建设之不同，在于将这门吸收世界前沿学问并提倡平等对话的学科向中国学术文化领域全面推进，同时也让中国历史文明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

研究成果，通过跨文化的桥梁，公之于世，进行对话和交流。这种学科转向是经过长期准备的。

四年来，乐黛云先生，法国著名汉学家汪德迈先生、金丝燕教授，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家王宁先生和民俗学家董晓萍教授等联袂投入，将跨文化研究由文学门类，推向中国古代哲学、传统语言文字学、民俗学和科技史学等主要使用中国思想材料研究中国学问的领域，使多元文化发展与跨文化学学科建设整体关联的理论付诸实践。令人欣喜的是，中外学者对此一致响应，现在陆续出版的这套丛书，正是各国教授共同努力，从各自以中外不同视角长期从事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中，精心提炼的一部分研究成果。

我们希望这套丛书能为跨文化学的理论和方法论建设提供砖瓦，也期盼中外高校跨文化学研究的人才队伍不断壮大。

本项工作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的长期支持，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和北京师范大学跨文化研究院敦和学术基金提供了出版资助，谨此一并致谢！

“跨文化研究”丛书编辑委员会

2018年8月28日



作者像

作者简介

于鲁·瓦尔克（Ülo Valk），民俗学博士，爱沙尼亚塔尔图大学（University of Tartu）爱沙尼亚语与比较民俗学系教授，塔尔图大学文学与比较民俗学系原系主任。国际叙事学会原副主席（ISFNR）。芬兰科学院专家，兼任《印度民俗学》杂志编委等多种职务。曾在印度阿萨姆邦长期从事田野作业。主要研究领域为民间宗教与民俗体裁理论、文化与社会、对话理论等，代表作有《黑衣绅士：爱沙尼亚民间宗教中的魔鬼现象》（FFC 276，赫尔辛基：2001）等。

内容简介

传统民俗学追寻故事的最初原型和地理历史分布；当代民俗学发生了转型，主要是将“民俗”重新概念化，着重探索民俗在当代社会文化建设中的价值。本书在这一方向上，创造性地建立了“信仰故事学”的研究分支。作者指出，信仰故事是历史上存续至今的民俗现象，它始终活跃，但也未曾独立；它始终与口头、文献在对话的关系中共存，但还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加以阐释。作者从理论、学术史和个案三方面构建研究框架，揭示这类民俗现象如何通过社会实践、风俗信仰、艺术交流、民众叙事和其他多元表现形式发生变化；怎样经过无休止的、不停歇的变异，反复创造与再创造，又怎样经过群体打磨与共享，形成大众文化产品，成为当代社会文化的成分。在全球化和网络信息化时代，信仰故事学的研究，有助于揭示民俗怎样既遵循传统体裁模式，又参与现实社会文化活动，呈现出新精神文化建设的巨大空间。

目 录

总 序 || I

第一章 民俗信仰研究的理论 || I

第一节 民俗与话语：科学修辞的权威性、 从无神论到新精神文化建设 || 3

第二节 理解宗教与信仰 || 24

第三节 大众信仰理论 || 43

第二章 民俗信仰研究的学术史 || 71

第一节 19世纪信仰研究的几个步骤 || 73

第二节 专业民俗学：从系统收集到研究 || 79

第三节 苏联时期的信仰研究 || 89

第四节 概念化的新发展 || 100

第三章 民俗信仰故事研究的个案 || 109

第一节 记忆资料的处理方法 || 109

——“独自在家”个案 || 109

第二节 “迷信” 资料的处理方法 || 127

——“网络论坛” 个案 || 127

主要参考文献 || 156

附录 “跨文化研究” 丛书书目 || 191

民俗信仰研究的理论^①

民俗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诞生于19世纪，是欧洲浪漫主义思潮的产物。当时许多国家的学者都热衷于收集古董和古本，利用口头资料，重新对历史文献做解释，再编成新的文本。他们认为，新文本才是国家民族的历史遗产，包括前基督教时期的神话、信仰和相关民俗资料，是古代文化有价值的遗存。新文本也是一座文学纪念碑，很多学识渊博的学者都参与了它的创造，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德国的格林兄弟（Jacob Grimm & Wilhelm Grimm）、芬兰的隆洛德（Elias Lönnrot）和爱沙尼亚的弗里德曼·雷霍德·柯卢兹沃德（Friedrich

① 本部分研究曾获爱沙尼亚科学基金会的资助（项目编号：7516）与欧盟欧洲区域发展基金的支持。向爱沙尼亚沃索的信息提供者 August Kilk 与 Hiiumaa 致谢，一并感谢 Daniel E. Allen 为本文进行英文润色。

Reinhold Kreutzwald) 等。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 新文本一直都是欧洲民族文化的范本。

当时的民俗学, 在处理民俗资料方面, 盛行进化论的方法和超有机论的方法。民俗学者信奉直线进化观, 也有早期民族主义的观点, 并在这种思维框架下, 对“民俗”一词进行概念化。概念化都有核心理念, 那个时期民俗学者的核心理念就是将民俗视为濒危的、保守的, 是未受到学校教育人群的、未受过现代化影响的民众所享有的文化, 民俗即将在工业化时期消失。当然, 后来民俗学者摒弃了这种旧概念。当代民俗学者重新对“民俗”概念化, 在理论上, 关注表演、大众产品、话语的自组织实践、社会系统的关系与运行, 以及民俗功能。

传统民俗学的研究方法, 包括追溯故事的最初形式、查找故事的历史分布、在传统社会文化的语境中发掘故事的深层含义, 现在这些方法已经很少用了。按照重新概念化的“民俗”的理念, 民俗, 不是世代相传的连续文本, 不是来去如风的无形艺术, 不是被概念化过程所生产和加工的人为制品, 而是通过社会实践、艺术交流、民众叙事、风俗信仰和其他多样化的表现形式, 经过无休止的、不停歇的变异, 并经过反复的创造与再创造, 所形成的大

众文化产品。民俗，也是从多角度认识，再经过共享的打磨，最后沉淀下来的浓缩品，同时也是口头表演和书面记载双向传统的具体文本。在以上界定的基础上，可以说，民俗是遵循传统体裁模式叙述故事的事件。

在“民俗”新概念的框架下研究民俗，很多结果告诉我们，当代民俗的范畴与存在形态是多样化的。其中，有一些事象呈现为民俗，有一些事象演变成支配性的大众文化，也有一些事象已经边缘化，还有的民俗事象消失了。只有一种民俗事象很特别，它始终活跃，但也未曾独立，而是始终与口头、书面文献在对话的关系中共存，呈现为一种善于对话、富有生命力的民俗体裁，它就是传说故事。在本书以下章节的讨论中，还将多次提到传说故事，并分析它。

第一节 民俗与话语：科学修辞的权威性、从无神论到新精神文明建设

在过去的几个世纪中，有些启蒙人士、学术社团和宗教组织推广识字运动，扩大了书面用语的影响，民俗的表达形式开始靠向体制化的世界观。传统民俗的表达是自发

的、无组织的、无系统的、无规划的。相比之下，体制化的表达是有组织的、有系统的和有规划的。体制化的表达产生同质化的信条、统一的指令和意识形态系统。这两种表达形式，在基督教化过程、启蒙思想运动、民族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精神文化建设中都存在。在现代社会中，体制化的表达渗透到整个社会中去，对民俗产生不可回避的影响。现在人们可以看到的是，两种表达都趋向于一元论的、真理性的概念，就像巴赫金（Mikhail Bakhtin, 1895—1975）所概括的那种，很容易形成权威性和极权主义的话语。巴赫金还认为，在欧洲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中，有一种“狂热崇拜”的东西，它强化独白原则，并能生成意识形态生活的主要因素。^① 巴赫金的这个观点，使我们想起福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的话语的自组织实践的概念。福柯的大体意思是，在一般情况下，多个作者生产的陈述、思想和告白，是不同的文本，有不同的生产范围，彼此存在的状态也是分散的，但是在特定的历史阶段，当它们具有共同的对话对象时，它们也能构成

① Bakhtin, Mikhail, "Problemy Poetiki Dostoyevskogo". *Sobraniye sochinenii* T. 6. Moskva: Institut Mirovoi Literatury imeni M. Gorkogo Rossiiskoi Akademii Nauk, 2002, p. 93.

一些共享的概念。^① 在两种表达形式中，在涉及权威、思想、陈述和告白时，都有自我规定的世界观标准，都在维护某种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将民俗与体制化的话语相比，两者的共通之处在于，彼此会经常发生交集；差异在于，民俗是社会角色中的个体词语实践，有时不能完全融入制度，是由个体声音组成的，与体制化的观点未尽一致。话语是制度的声音。话语意味着纪律。使用话语就意味着对感觉、思想和表达的限定。民俗赋予表达的自由和即兴创作的自由，使用民俗就意味着变化和创造。本节以下讨论民俗与话语的关系，主要使用爱沙尼亚民俗、宗教和精神

① Foucault, Michel,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1972, pp. 31-39. 译者注：作者在这里引用福柯《知识考古学》的英文原文是“discursive practice”，但由于此概念在欧美学界已产生广泛影响，国际民俗学界已广泛应用，并已在国际民俗学者的专业圈内有了通用的阐释，形成了共识，故作者在此引用福柯原著中该概念的出处长达9页（第31至39页），实际上是采用了其他多种民俗学著述的综合意见加以概括，而并非按原文直译。译者根据福柯原著英文原文和作者综合性概述的上下文，在此将“discursive practice”译为“话语的自组织实践”，这样能体现作者从民俗学角度回应福柯所要表达的意见，也尽量使中国读者容易理解。谨此感谢旅法学者陈力川先生在协助译者核对福柯《知识考古学》法文原版时所提供的帮助。另见，Yurchak, Alexei, *Everything Was Forever, Until It Was No More: the Last Soviet Generation*. Princeton,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 161-162.

文化建设的资料进行讨论。

自 19 世纪末起，爱沙尼亚的公共领域发生了变化。不同的观点、代言人和思想体系，变得更加多元。当然也有竞争，路德教会和乡村学校之间就有竞争。路德教会和乡村学校都推广识字，双方经过几个世纪的努力，把爱沙尼亚由一个农民社会变成了一个读书的国家。沙皇入侵后，全面推行俄国化，扶持东正教。这时爱沙尼亚民族运动兴起，路德教会的牧师雅各布·霍特（Jakob Hurt）成为领导者，他系统地收集爱沙尼亚的民俗资料，将其概念化，建设爱沙尼亚古代记忆的宝库，编纂爱沙尼亚人民口述的历史文明书籍。但一部分德国精英致力于爱沙尼亚农民文明化的目的，是要在爱沙尼亚推行德国话语化，而俄国沙皇在爱沙尼亚强行推行俄国化的结果，是造成了爱沙尼亚人的身份认同，这是两种制度化的话语，有两种不同的导向。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告终，在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爱沙尼亚共和国于 1918 年宣告成立。1920 年，爱沙尼亚与苏维埃社会主义政权在塔尔图签订了和平条约，双方互相承认各自是独立国家。

从 19 世纪末开始，爱沙尼亚的各种书刊就转向介绍自然科学知识，支持科学唯物主义世界观。爱沙尼